

世界综合区域学研究的 俄罗斯学派及其传统*

〔俄〕叶·瓦·科尔东诺娃 克·亚·叶芙列莫娃

【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整体化的科研教学流派，世界综合区域学由诸多理论结合而成，包括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历史学、宏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地理学以及国际问题周边学科等。本文详细描述了国情研究中的地理学与社会学方法及二者对确立现代世界综合区域研究论域与研究方法之贡献，并在此基础上，将俄罗斯的世界综合区域学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18~19世纪综合性东方学与国情学的诞生；20世纪20~40年代经济及社会政治问题丰富了传统国情学内涵；20世纪50~70年代尝试运用专业学科及跨学科知识分析区域现象及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整体化的区域学研究方法，确定世界综合区域研究论域，创建理论工具。冷战后区域学之对国际学术的影响是显著增长的。为理解全球问题与本土问题相互制约的关系特征，必须立足于具体区域状况与具体国情，对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加以研究，唯其如此，才能对全球趋势进展规模及后果作出评判。据此也可以说，全球化并未减弱而是增加了从专业角度理解世界区域的需求。

【关键词】 世界综合区域学 区域学 国情学 区域主义 国际关系学 世界政治

【作者简介】 叶·瓦·科尔东诺娃，俄罗斯外交部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方学教研室副教授，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克·亚·叶芙列莫娃，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问题与区域项目中心研究员。

【译者简介】 王嘎，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世界综合区域学，俄文为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МКР)。对于 комплекс/complex 一词，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将其译为“复合体”，本文提及的巴里·布赞的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国内一般译为“地区（或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俄文术语作者沃斯克列先斯基通汉语，建议将相应的中文术语表达为“世界综合区域学”，以突出研究方法、所覆盖问题和分析视角的综合整体性。

国际关系两极体系的瓦解，为有关全球化的学术讨论创造了条件，技术创新、交通与基础设施的迅猛发展，也使“世界是平的”这一论断的逻辑性似乎更加充分^①。20世纪90年代初就普遍认为，全世界国际政治进程的变量已归于一统，而各区域之间则形成“较低”层级的国际协作，其特征与全球系统相一致。从区域一体化发展来看，甚至当欧洲联盟成立，某些一体化要素随之溢出西方世界，欧盟仍被视为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天然样板。

然而，面对与世界政治空间相关的诸多复杂趋势，此种“普适主义”观念随即失去解释力。区域层面上国际关系的动态发展，欧洲、亚洲、拉美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迹象，从聚焦于军事政治安全转向更为复杂、覆盖经济社会及技术标准的内容丰富的区域主义之演变，层出不穷的跨区域进程及其事实上的定局^②，所有这一切塑造着现代性复杂多样的图景。

尽管如此，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国际关系学中，西方中心主义立意依然明显占据优势。这并不单纯体现为研究者对非西方国家现状的忽视，虽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信息与分析脱节的状况始终存在。例如，通过分析《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欧洲国际关系学刊》（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三份国际关系重要刊物，德国全球与区域问题研究所学者约翰内斯·弗勒斯于2014年撰文指出，国际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地理失衡”^③，以非西方国家经验为材料的论文数量之少即是失衡的明证。在此状况下，某些原本可能从非西方政治语境中产生的国际关系理论付诸阙如，甚至加剧了国际关系学既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英国著名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美籍印裔研究者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合作编著^④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亚洲及亚洲以外的视角》即显现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何以缺失这一尖锐问题。作品的问世引起国际学术界热烈争论，并延续至今，其中非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确立及前景成为诸多国际学术研讨及学术项目的主题。在国际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力促之下，在阿查亚于

① Фридман Т. Плоский мир.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XXI века. М. : АСТ, 2007.

② 参见李兴、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编著：《欧亚中心跨区域发展体制机制研究》，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495页。

③ Vullers J. Geographical Patterns of Analysis in IR Research: Representative Cross – Regional Comparison as a Way Forward/J. Vullers//GIGA Working Paper №256. September 2014. https://www.giga-hamburg.de/en/system/files/publications/wp256_vuellers.pdf

④ *Non –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Ed. by B. Buzan, A. Acharya. Abington: Routledge, 2010.

2014 ~ 2015 年担任学会主席期间,非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问题受到格外关注,随后,某些由印太国际关系研究者组成的专业协会也予以积极响应。

上述研究未能体现俄罗斯的现实情况,故而需考虑国内学术与教学工作应以何种方式回应当前形势,即国际生活的经验事实及世界变迁在思想认知上所造成的双重挑战。在此语境下,本文将世界综合区域学研究视为有助于形成国际进程正确观念的学术流派和一门学科,并对其发展趋势展开分析。

一 世界综合区域学研究:为分析与研究方向提供框架

自两极对立终止以来,俄罗斯学术界关于世界本质性变化的讨论经历了若干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初,一个热议的问题是新时期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两极分化的变量,乃至与之对应的国际合作的领导、结构和环境。俄罗斯最主要的学术刊物,如《东方》(Oriens)《城邦》(Полис)以及近年来的《国际进程》和《比较政治学》,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同样引发思考与争鸣的还有本质上属于另一些进程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从国际关系向世界政治的转变、广义上作为“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变异^①、国家的作用及其基本属性——国家主权的质变、内政与外交政策界限的消弭。

迄今为止,以上所有问题均未失去现实意义,反而构成了共同的语境,用以分析另一重要现象——所谓“区域世界”^②的出现,亦即因交往更密切的区域空间(也可用术语表述为“区域复合体”或“世界政治一体化的行为者”)^③之形成而呈现的国际进程多样化,它们以各自方式折射着全球变迁,催生着国际关系的独特类型。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巴里·布赞根据东南亚的情况首次提出“区域复合体”这一概念。后来在 2003 年出版的《区域与权力:世界安全结构》一书中,他与合作者奥利·维夫将其扩展为“区域复合体”理论,使之适用于安全领

① Лебедева М. М. Что угрожает Вестфалю? / М. М. Лебедева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2008 (январь – апрель). Том 6. № 1 (16). <http://www.intertrends.ru/sixteenth/015.htm>

② 该术语于 2015 年国际研究学会年会上提出,年会主题是“全球国际关系与区域世界:国际研究新议程”。

③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Введение в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Учебник / Под ред. проф.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М.: Магистр: ИНФРА – М, 2015. С. 393.

域^①。至今仍然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是，国际政治区域是否有可能转型为“区域复合体”，亦即不仅限于国际安全领域的彼此相关的区域空间^②，转型是否有迹可循，全球层面（global level，即全球大国在区域政治中的角色）对这些进程会有多大影响，而后者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全球层面。以贸易自由化为例：为实现贸易往来的集约化，在全球层面上创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但在实践中，贸易自由反而更为积极地发生在区域层面（经由某些达成自由贸易区协议的区域组织）。此外，金砖五国等新型国际角色的出现，以及亚洲（首先是中国和印度）、非洲（南非、尼日利亚）和拉丁美洲（巴西）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促使国际经济关系形成更显著的多中心结构，以至于未来经济交往的政治部分也势必受到这一结构的持续影响。但此种多样化局面以及由此涌现的新经验与新信息，却未能造就有别于西方国际关系基本理论的思想观念。国外学者争论的焦点是：通过对非西方现实更细致的考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能够解释什么和不能解释什么。

非西方国际关系主要有两方面的理论探讨：其一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区域化或民族化”，其二是从本民族哲学思想深处发掘理论解释的新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俄罗斯及中国等诸多国家而言，这是典型的研究路径^③。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就有过在中间层面（区域层面）与国际系统及民族国家层面之间创建理论概念的诸多尝试，例如奥兰·扬的“政治非连续性”概念（political discontinuities）^④，布鲁斯·拉塞特的国际区域概念^⑤，路易斯·坎托里和史蒂芬·斯皮格尔共同提出的区域“次体系”（subordinate system）

① Buzan B.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B. Buzan, Wæver 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А. Д. Регионализац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Современны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Под ред. А. В. Торкунова.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2. С. 103 – 116.

③ Ikeda J. The Post – Western Tur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English School/J. Ikeda//Ritsumeikan Annu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0. Vol. 9, pp. 29 – 44; Shih Ch. *Sinic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 Civilization, and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Subaltern East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Цыганков А. П. Российская те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акой ей быть?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2014. №2 (15) . С. 65 – 83.

④ Young O. R. “Political Discontinu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ld Politics*. 1968. Vol. XX. pp. 369 – 392.

⑤ 布鲁斯·拉塞特将区域划分为五种类型：（1）社会文化相类同的区域；（2）持同样政治立场（以在联合国的立场和表决为区分标准）的区域与国家；（3）政治上相互依赖的区域，其范围内存在着国家间或超国家机构；（4）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区域；（5）地理区域。

存在理论^①，M. 布瑞彻对区域子系统（subsystems）的划分^②以及威廉·汤普森的区域子系统功能分析^③，等等。然而，这些理论却长期处于研究方向的边缘。20 世纪末，其边缘化程度更为加剧，因为世界政治讨论的主流思想认为，东西方集团对抗结束后，全球化浪潮空前高涨，大有消除国家与区域间差异之势。

而俄罗斯学术界同时另辟蹊径，将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与国情学结合起来，形成所谓“世界综合区域学”（或针对教学过程的“国外区域学”^④）。在不排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资源的前提下，此项研究重在辨析国际与国内进程及区域内进程之间的关联，揭示国内与区域内发展特点对全球层面之影响。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著名学者帕·齐甘科夫和安·齐甘科夫指出，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大问题是中层理论的缺失^⑤。从理论的“柔性”而非“硬性”理解出发，借助理论知识的实证性阐说，结合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所忽视的空间因素，世界综合区域学研究致力于填补的正是这片空白^⑥。

二 俄罗斯区域复合体研究传统：主要阶段与学派

在俄罗斯，世界综合区域学研究始于对传统国情学危机的回应，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无论对俄罗斯还是对世界的论述都属于后者的范畴。当两极体系瓦解之际，国情学基本上完成了描述非殖民化及大量新国家产生的使命，相形之下，其解释与预判的潜力则相当有限。俄罗斯的世界综合区域学研究学派，更具体地说，作为其科研相对成熟表现形式的莫斯科外交学院世界综合区域学研究学派，从非西方社会^⑦及东方历史^⑧结构特点的理论解释出发，并借助区域子系统

① Cantori L. J. S. L. Spiegel.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gions*.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Inc. , 1970.

② 迈克尔·布瑞彻提出下列划分区域子系统的标准：（1）空间范围有限，空间的最好形式为地理区域；（2）至少具有三个子系统单位；（3）其他实体承认，子系统现有参与者能够构成一个完整区域或全球系统的一部分；（4）各方参与者认识到它们自身能够构成子系统；（5）相对于系统而言，子系统单位实力水平较低；（6）全球系统变化对子系统影响较大，而非相反。

③ Thompson W. R. "The Regional Subsystem: A Conceptual Explication and a Propositional Invent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73 (March) . Vol. 17, No. 1. pp. 89 - 117.

④ “国外区域学”这一专有名词表明本科生及硕士生培养方向，并在俄罗斯联邦高等教育标准中得到运用。

⑤ Цыганков П.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у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ов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М.: ПЕРСЭ, 2005.

⑥ Voskressenski A. D. *Non - Wester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⑦ 参见 Л. С. Васильев 等人的论著。

⑧ Алаев Л. Б. История Востока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М.: ЛЕНАНД, 2019.

这样的体系化的国际关系分析工具，开始了自身的发展。按照国际关系研究的系统性方法，将系统各部分视为子系统加以考量的可能性从最初就得到关注，其中包括在国际协作方面独具规律性的区域子系统^①，但区域子系统的思想概念仍需进一步发展。

正因如此，俄罗斯区域学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包括集体论著《东方/西方：国际关系的区域子系统及区域问题》^②《世界政治中的中国》^③《大东亚：世界政治与区域转型》^④，捕捉到了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趋势及发展特点，不仅在相关领域别具新意，而且比西方著作更胜一筹。如今，在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联合国大学区域一体化比较研究院（UNU – CRIS，设在比利时的布鲁日）等西方机构，区域化研究也开始焕发生机。

作为研究方向与教学中的学科，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教授主编的三部作品——《世界综合区域学概论》^⑤《世界综合区域学》和《国外区域学及世界政治实践》^⑥，标志着俄罗斯的世界综合区域学构架之形成。该学科特点在于整体性、跨区域性，并采取比较法和跨学科研究法。其重点是同世界政治联为一体的组成部分，分析则聚焦于区域及宏观区域层面上具有全球影响的世界政治因素，从而构成世界区域研究的典型特征，使区域问题研究者得以透过独特的分析，将整个现代世界纳入视野，洞悉至今仍处在阴影中的普遍规律。

从思想观念来看，世界综合区域学乃是传统国情学的继承，由诸多理论结合而成，包括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历史学、宏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地理学以及国际问题周边学科等。其论域和方法的确立，受到地理学和社会学这两种互为补充的、针对国外地方与区域的分析方法之影响。地理学和社会学推动了一整套世界区域研究方法的形成，这两种传统相互

① Восток/Запад: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подсистемы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Под ред.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 8.

② Там же.

③ Китай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Под ред.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М.: РОССПЭН, 2001.

④ Большая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научно –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М.: МГИМО –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0.

⑤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Введение в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Учебник/Под ред. проф.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М.: Магистр: ИНФРА – М, 2015.

⑥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А. Д.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Е. В. Колдунова, А. А. Киреева, С. И. Лунев. Под ред.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М.: Магистр: ИНФРА – М, 2014; Практика зарубежного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и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Под ред.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М.: Магистр: ИНФРА – М, 2014.

影响并相互渗透,就此展开分析,有助于理解这一年轻学科当前所经历的种种变迁。坚实的学科基础,赋予当代综合区域研究以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学术深度。与此同时,在共同而综合的方法论框架内,地理学和社会科学成果相结合的趋势一方面决定着世界综合区域学研究的协同效应(синкретичность),另一方面也决定其兼容性(эkleктичность)。通过现代科学知识的跨学科特征,协同与兼容的二分法在世界综合区域学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

下面,我们将目光转向世界综合区域学作为完整独立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按照问题及时间先后的普遍逻辑,将其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1. 综合性(百科知识的)东方学与国情学的诞生(18~19 世纪)。在此时期,奠定了东方学/国情学的俄罗斯学派基础,国家创立了多个研究俄罗斯国内外(包括东方国家与东方民族)问题的学术中心。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东方学/国情学论域互相交融,学术方法综合化,科学研究具有历史—哲学的成分。

2. 经济及社会政治问题丰富了传统(历史—哲学的)国情学(20 世纪 20~40 年代)的内涵。其间对于现代实用意义的、定位明确的东方学/国情学的兴趣迅猛增长,教育领域出现了传统语言国情学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同时并行发展的是经典东方学研究,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宣告成立(1930 年)。

3. 运用专业学科(经济地理学、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及跨学科知识分析区域现象及进程的最初尝试(20 世纪 50~70 年代)。东方学逐渐脱离历史—哲学范畴而转向社会学学科,地理国情学也有同样的转向。在苏联科学院体系内,非洲研究所(1959 年)、拉美研究所(1961 年)、远东研究所(1966 年)、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1987 年)等一批专门的区域学专业问题研究所相继成立。

4. 形成整体化的区域学研究方法,确定世界综合区域研究论域,创建理论工具(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此时期,俄罗斯国情学与国外区域学开始相互结合。在欧洲委员会领导下,创办了欧洲国际关系及区域研究信息网(EINIRAS),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成为其成员。俄罗斯区域研究学派发展迅速,世界综合区域学研究理论与方法问题引发学术共同体的积极探讨。

我们对四个阶段分别进行更为详细的评述。

(一) 第一阶段

早期俄罗斯地理国情学发端于异域风土细致入微的记述,此即所谓“纪行”

(хóждение), 记述者是 12 ~ 17 世纪的俄国香客和商人旅行家^①。随后这一文学体裁得到创造性的再认识, 开始服务于科学事业。可以说, 这些旅行记为 Н. М. 普尔热瓦尔斯基、П. П. 谢苗诺夫 – 天山斯基、П. К. 科兹洛夫、Г. Н. 波塔宁、В. А. 奥勃鲁切夫、Н. Н. 米科路霍 – 马克莱等俄国地理学家及其他杰出学者的百科知识式著作奠定了基础。18 ~ 19 世纪, 关于俄罗斯帝国亚洲部分及毗邻地区的区域地理基本情况报告陆续问世。地理学 (连同国情学) 趋于制度化。1845 年, 俄罗斯地理学会成立, 宗旨是研究与分析俄罗斯国内外地方。发挥类似功能的还有巴黎地理学会 (1821 年)、柏林地理学会 (1828 年)、伦敦地理学会 (1830 年), 各自对欧洲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及附属领地展开研究^②。这是综合性学术研究的时期, 不仅涉及地理学, 还涵盖历史、社会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

在当时的俄罗斯国内外, 与地理国情学平行发展的是人文国情学, 研究对象是东方民族的历史、哲学、宗教、文化、艺术、语言、文学。在这种知识的混合体上, 逐渐形成独立的历史—哲学流派, 名为东方学, 或者按照西方传统, 叫作东方研究 (Oriental Studies)。从 18 世纪开始, 对东方的兴趣普遍提升, 东方研究的国家学派应运而生, 如俄罗斯学派、英国学派、法国学派、德国学派等。为俄罗斯东方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有 Н. Я. 比丘林、В. Р. 罗森、С. Ф. 奥登堡、Ф. И. 谢尔巴茨科依、В. П. 瓦西里耶夫、В. В. 巴托尔德、И. Ю. 克拉奇克夫斯基、Н. И. 康拉德、Н. А. 涅夫斯基、И. А. 奥尔别里、В. М. 阿列克谢耶夫、Б. Я. 弗拉基米尔佐夫、М. Н. 波戈留波夫、И. М. 斯杰勃林 – 加缅斯基、С. Л. 齐赫文斯基、Н. А. 西蒙尼亚、В. С. 米亚斯尼科夫、Б. Л. 李福清等众多学者。

发展东方学/东方研究的需求不仅缘于学术考量, 还有实用性的意图。外交和军事部门、商业公司、宗教使团及欧洲各大国殖民地行政机关, 均需要掌握东方民族语言、宗教、习俗的专门人才。对于同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清帝国等邻国保持传统交往的沙皇俄国而言, 东方学实用人才的教育培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1815 年, 莫斯科创办了教授波斯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拉扎列夫学校。

① Малето Е. И. Антология хождений рус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XII – XV века. М.: Наука, 2005. 437 с.; Хождение за три моря Афанасия Никитина 1466—1472 гг. /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В. П. Адрианова – Перетц. Изд. 2 – 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и переработанное. М. – Л.: Из – 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8. 283 с.; Хождение купца Федота Котова в Персию. /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 А. Кузнецов. М. – Л.: Из – 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8. 111 с.; и др.

② Машбиц Я. Г.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Смоленск: Изд – во СГУ, 1998. С. 34.

1823 年,俄外交部亚洲司东方语言学校成立,培养外交部门所需专业人员。1824 年,在奥伦堡建立了涅普留耶夫军校(从 1844 年起,改为士官武备学校),为俄军培养东方语言的军事翻译人员。1897 年,在塔什干组建了类似的讲习班,隶属突厥斯坦军区。俄罗斯正教会派出修道士,在巴勒斯坦、埃塞俄比亚、中国等地方建立多个传教会^①,对俄国东方学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

(二) 第二阶段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地理学面临着集中力量进行应用性探索,促进工业化发展的新任务。尤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详细研究国家领土的趋势占了上风,目的是为全力开发国土自然资源潜能提供科学保障。在此背景下,国情综合研究的苏联学派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形成,首先确立的是经济地理学思想实践方向,以满足苏联工业增长的需求。除了深入分析工业布局 and 区域划分的理论问题,通过地理国情学,还分别实施了对共和国、区和州的具体研究:开展各种考察活动,绘制并出版经济地图与图册。在“内部”国情学(Н. Н. 巴兰斯基、Н. Н. 科洛索夫斯基)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国外情况研究(В. М. 施泰因、И. А. 维特威尔等)也在持续发展。

然而,苏联国情学的成长始终处于严酷的意识形态压力之下。许多经济地理学代表人物认为,国情学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具体区域和国家材料上的运用,他们否认国情学以外还能有其他独立学科和方法。Н. Н. 巴兰斯基试图重新审视这些观点,为此遭到某些教条主义地理学家和哲学家的激烈批判。有人指责他过高评价自然对社会经济变迁的作用,并且指出,具体地方的社会研究与自然研究不可能相互关联,因为从马列主义立场来看,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在本质上截然不同。此外,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看法,20 世纪 30 年代,人类学作为一个完整学科被消灭^②。所有这些因素,严重限制了国内地理国情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

在苏维埃俄国,创立东方学的目的是服务于马列主义思想,后者预言了世界革命即将到来。关于世界步入“亚洲觉醒”时代的认识,刺激着苏俄政府对东方学发展及教育事业予以高度关注。1921 年,在莫斯科,以拉扎列夫学院以及

^①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в России//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Кругосвет" . [http: //www. krugosvet. ru](http://www.krugosvet.ru).

^② Машбиц Я. Г.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Смоленск: Изд - во СГУ, 1998. С. 37. ; МIRONENKO Н. С.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ы. М. :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1. С. 15.

其他一些高校东方学系为基础，创建了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教学纲要中设置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学科和世界经济及国际政治形势方面的课程^①。1930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在列宁格勒成立。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教条客观上限制了东方学研究方法的进展。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70年代先后展开，暴露出苏联科学的思想短浅，无力分析现实的历史进程。尽管东方学研究者经过持续探索，力图将马列主义理论基本原理运用于亚洲和非洲国家，提出了一整套思想、概念和方法，取得丰硕成果，证明了苏联知识界高水平的思维能力^②，国内社会学方法论的总体状况却令人沮丧。主要问题是故步自封，对西方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的成就知之甚少，在最好情形下，苏联学者也只能从封闭的专门书库（特别档案馆）才允许存放的少数批判资产阶级理论的论著里略有所知。一批社会学科，如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乃至遗传学，被宣布为“伪科学”而禁止研究。这些惨痛情况阻碍了苏联东方学理论基础与基本方法的完善。

在西方国家的东方研究方面，也表现出向苏联东方学式的社会经济与社会政治学偏移的特征，区别仅在于，其自然演进未受到人为树立的意识形态及方法论壁垒的阻挡。20世纪50年代最初时期，作为对于构成西方世界东方研究基本范畴的传统历史—哲学学科之补充，英语学术界形成了历史与社会学派别相结合的独立跨学科流派，称之为区域学（Area Studies）。如同苏联东方学，区域学从地理学脱胎而出，借助多种科学方法，随即从“针对特定区域的地理研究”转变为“一般区域的研究”^③。

区域地理学在西方进展积极，逐渐从描述演化为概括。法国、德国及英美学派的理论创建广为人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德温特·维特勒西（Derwent Whittlesey）主持下，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RC）地质与地理学会特别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试图指明和揭示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的论

① Главы из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Лазаре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Моск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ГИМО/под ред. А. В. Торкунова.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4. С. 8.

② Ким О. В. Проблема азиатского способ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20 – е гг. начало 90 – х гг.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07. 00. 09 –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 и метод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емерово, 2001. С. 3 – 4.

③ Farmer B. H. Geography, “Area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Are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1973. No 60. p. 2.

域。报告合著者详细分析了“区域”(region)概念,论证了世界区域划分的标准、区域的类型学形式、基本特征乃至区域分析的基础理论方法^①。如此一来,在英语文献中,作为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区域研究与更多属于人文知识领域的区域学,在术语上便获得明确区分。

区域研究的思想观念在美国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沃尔特·伊萨德(Walter Isard)的论著中获得进一步发展,被提升到“科学”(区域科学,Regional Science)的高度。20 世纪 60 年代,伊萨德关于区域分析方法论的著作^②被翻译成俄语,对苏联经济区域研究理论基础的形成作出重大贡献。伊萨德方法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数学方法用于经济数据和预测的空间分析。例如,在他的论著中,依据居民点和交通枢纽的数量特征对它们进行分级被赋予重要意义,工业企业布局被视为种种生产因素(为原材料所吸引,或者相反,为销售市场所吸引)影响下的自然结果,通过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区域不均衡现象解释人口迁移,等等。

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激发了对非西方各国在自主发展道路上社会经济与政治转型的研究,继而推动了西方区域学思想理论形成独立的学术流派。传统语言国情学(东方研究)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和异域风土民情独有的特色,却无法提供对应的分析工具,用以研究和解释它们在发展中表现出的普遍规律性。而另有一些学科(如现代化理论或后殖民研究)则缺乏与亚非拉社会具体事实相匹配的知识,以致严重影响到各自的分析质量。相比而言,区域学如同汇集多种科目和多种学科的沃土。

在区域学作为一项特殊学科的形成过程中,20 世纪 40~60 年代末流行的发展论(developmentalism)思想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发展论的基本假设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处于现代化“第三梯队”的欠发达国家将赶上“第一梯队”工业化发达国家,只要借鉴它们的先进经验,效仿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与机制。由于该理论主要针对亚非拉地区落后国家,在其框架内从事研究的学者就必须借助区域问题专家的经验。而后者自身也因为将社会经济问题纳入视野,扩大了区域学论域,从而使之发生变异。于是区域学距离传统历史—哲学的东方研究越来越远,变得更像是学术思想的社会学学科。

① Whittlesey D. et al. Regional Stud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Geography. Washington, D. C. : Division of Geology and Geography,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52. p. 74.

② Изард У. Метод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Введение в науку о регионах. М. : Прогресс, 1966.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区域学形成于同样的年代。欧洲历来有研究殖民地及非独立地区民族的传统,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澳两国只有少数爱好者投身于东方研究。战后十年期间兴起的非殖民化进程,促使政治家及社会问题学者将兴趣转向亚洲与非洲某些国家和地区。因而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美国陆续组建了专门的区域研究机构,为美军方和中情局拟定专业人员培训纲要。它们以实践为导向,将一些罕见的东方语言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列入教学范围。美国区域学逐渐自成一体,开始在大学及相关学术机构里自由讲授。90年代初,已有超过一半的美国高校为学生设置了区域学专业课程^①。在保持强大历史—哲学传统的欧洲国家,经典的东方研究也发生了类似的“重组”。

(三) 第三阶段

对地理学中量化分析法的兴趣,源于沃尔特·伊萨德及其他作者的论著,一时间成为热门,又迅速冷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已出现了地理学向人文学科的回归,折射出社会地理学研究日渐流行的生态学理路及人文倾向。在同一时期的苏联,跨领域的经济—地理学派沿着国内传统继续发展,是为“综合国情学”。Н. Н. 巴兰斯基、Н. Н. 科洛索夫斯基、И. А. 维特威尔、И. М. 马耶尔果伊兹、В. П. 马克萨科夫斯基、Я. Г. 马什比茨、Н. С. 米罗年科、В. А. 科洛索夫即是该学派杰出代表。在这些人物及他们的学生的努力之下,建立了苏联所有区域的系统化概论,撰写了近百部国外地理学专著。1975~1985年间,二十卷本的国情学丛书《国家与民族》陆续出版,在民族学、历史学和社会政治方面的资料基础上,增添了物理学与地理学以及社会经济等学科的内容^②。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俄罗斯地理国情学因一些新的理论学说和新的流派而日益丰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人文地理学(Д. Н. 扎米亚京)、选举地理学(электоральн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Д. Б. 奥列什金和 Н. В. 彼得罗夫)和政治区域学(И. М. 布瑟京娜、Р. Ф. 图洛夫斯基)。其间由于区域化趋势的显著表现,世界地理学界就区域概念展开了积极研讨(约翰·阿格纽、安希·帕西、安妮·吉尔伯特等)。讨论的焦点在于:区域是否成其为事物的独立本质或社会结构。不过,某些学者认为,问题本身提得就不恰当。如著名美国地理学家约

^① Lambert R. D. 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N. J. Smelser, P. B. Baltes, eds. Oxford: Elsevier, 2001. p. 687.

^② Мироненко Н. С.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ы.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1. С. 42.

翰·阿格纽 (John Agnew) 就曾表示,“区域反映世界上各种 (客观) 差异以及对这些差异的认知”^①。在他看来,将区域概念同某个单一部分相结合的尝试是徒劳无功的。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国情学/区域学也有过关于区域自然问题的类似探讨^②。

需要指出的是,东方学/区域学 (无论国内外) 论域并非一成不变,相反,20 世纪下半叶,从一系列社会学科“流入”的新思想、理论和方法使之愈加丰富。此种状况也得益于一些主要评论刊物上的热烈讨论,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者和政治学家围绕着论题,将区域学理论方法的前提同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和社会/人文地理学 (Human Geography) 加以比较,试图为一个新生而完整的流派确定研究领域。在此趋势作用下,一整套方法日渐“成熟”,它脱胎于世纪之交的独立学科,已然成为现代世界区域研究的主流。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学术界便试图在传统区域学与社会学科之间“架设桥梁”。例如 1963 年,迈克尔·布瑞彻 (Michael Brecher) 在《世界政治》杂志发表文章,在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背景诠释亚洲研究 (Asian Studies) 的同时,又将南亚和东南亚视为一个特殊的国际关系区域子系统^③。1975 年,由白鲁恂 (Lucian Pye, 音译为卢西安·派伊) 主持编著的《政治学与区域学: 对手还是伙伴?》问世,该作品分析了科学知识两个邻近领域之间的基本区别以及如何寻求趋同的路径,并且同样强调了综合法的必要性^④。类似一批论著随后相继出

① Agnew J. “Regions on the Mind Does Not Equal Regions of the Mind,”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9. Vol. 23, No 1. p. 93.

② 参见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А. Д. Концепции регионализац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подсистем,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2012. № 2. С. 30 – 58; Каримова А. Б. Регион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6. № 5. С. 32 – 41; Киреев А. А. Понятие “регион” и предметно –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 Регионалистика. 2014. Т. 1, № 1. С. 18 – 32; Межевич Н. М.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категории “регион”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научном дискурсе // П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 2006. № 2. С. 3 – 22; и др.

③ Brecher 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sian Studies; The Subordinate State System of Southern Asia,” *World Politics*. 1963. Vol. 15, No 2. pp. 213 – 235.

④ Political Science and Area Studies: Rivals or Partners? / L. W. Pye,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版^①。尽管如此，这些作者照例并未更进一步，明确表示支持区域学之（跨）学科方法，故而他们所有的意见无论多么正确，都依然停留在良好愿景之上。

（四）第四阶段

整体化的区域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归因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西方（主要是英美两国）学术界展开的理论方法讨论之进展。为总结这些讨论的基本情况，可将居于核心的两个重要论题单列出来：（1）区域学与社会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2）区域学讨论的概念基础。以下是更详细的评述。

冷战终结以来，危及国际安全的因素发生本质的变化，由全球层面转移到跨国及超国家层面，区域学的紧迫性随之显著增长，因为只有该学科才能够详尽回答，全球趋势在世界各地怎样表现自身，以及各个社会在面对同样的全球化挑战之际反应如何（为何）各不相同。与此同时，对终生致力于具体国家或地区的区域学家之专业需求也与日俱增。对其中许多人士所期待的不仅是关于研究对象的知识，还有将其运用于种种社会学科（政治学、经济学等）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需要首先掌握相应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方法。对于传统历史—哲学模式所造就的区域学研究者而言，这些需求未免过高。

然而，对区域学家作为“异域”知识载体的兴趣却不断地衰减，而社会政治领域则需要他们转变为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其他国家，这些客观趋势都相当突出。正如哈佛大学教授、非洲问题专家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所指出的那样，“百科知识的表意的人文国情学”已经过时，从而为“语境知识与形式理论”的有机合成让开道路^②。按照这种趋势，区域学研究者理应成为区域学家及某一科目专家，在“普通”社会学家力所不及的领域内作出假设与测评，因为后者不掌握具体的区域现实与国别情况。尽管有来自旧式区域学研究队伍的潜在阻力，新的潮流却势不可挡，并且从 21 世纪初开始，决定着世界主要大学区域学专业教学纲要的内容。

^① 参见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Ed. by David L. Szanton.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Beyond the Area Studies Wars: Toward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Ed. by Neil L. Waters. Hanover, NH: Middlebury College Press, 2000; 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Strategies for Understanding Middle East Politics/Ed. by Mark A. Tessler, Jodi Nachtwey, Anne Banda.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Remaking Area Studi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ross Asia and the Pacific/Ed. by Terence Wesley-Smith, Jon D. Gos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 и др.

^② Bates R. H.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A Useful Controversy? //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1997. Vol. 30, No 2. p. 168.

第二次区域学“大争论”源头在于西方认识东方（东方主义）与东方认识西方（西方主义，оксидентализм）之间的文化差异。20 世纪 70 年代末，阿拉伯裔美籍文艺学家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出版并引起轰动^①，由此拉开了争论的序幕。在自己的作品中，萨义德力图解构东方这一在西方科学和文化占据领先条件下形成的概念，他认为，正是这两者将西方中心主义的“异域”风土人情之幻象强加给社会。他尤其强调，透过主要由西方学者创立的理论与概念而展开的东方观察，难免带有“文化殖民主义”印记，有碍于客观理解发生在东方的变迁。如此看来，将区域学界定为独特的跨学科学术门类，运用西方学者时常视之为丰富的非西方国家历史文化材料，以期寻求普遍规律和检验现有理论（多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凡此种种，在方法论上均属不恰当。

区域研究方面持东方学立场的批评家（阿米塔夫·阿查亚、巴里·布赞、大卫·桑顿、弗雷德里克·泽德尔鲍姆、马蒂亚斯·巴泽达乌、帕特里克·科尔纳等）则提出另一种研究方案，其基础是西方学者和非西方学者平等参与世界不同区域的研究。按照他们的观点，为弥合西方（the West）同所有其余地方（the Rest）之间的断裂，必须考虑非西方研究者基于自身文化及科学传统所积累的理论储备。因而他们力图将国际关系理论改造为真正普适性而非英美式（时至今日，事实上仍为英美式）的学科，甚至给它以新的命名——全球国际关系（Global IR）。

根据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的理论，新学科所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有如下几点：（1）多元化的普适主义；（2）植根于世界（而非希腊罗马、欧洲或美国）历史；（3）从至今仍被视为某种仅提供事实用以检验西方中心论的共同体之经验出发，重新认识既有国际关系理论；（4）对区域及区域主义研究予以重点关注；（5）反对民族中心主义及自我优越感；（6）扩大国际政治参与的内涵，其中不仅包括力量平衡，还包括抵制霸权主义问题、规范行为以及在本土层面构建全球秩序^②。

此外，主张重构经典区域学的学者还指出，关于世界各地方的传统研究，令人联想到详细的材料汇编和回溯式的事实比较，已经无法满足现今的需求，应当

① Эдвард В. Саид. Ориентализм. Западные концепции Востока. СПб. : Русский Мир, 2006.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 Y. : Pantheon Books, 1978].

② Acharya 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4. Vol. 58, No 4. p. 649.

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компаративистская методология）框架内加以再认识。例如，德国学者马蒂亚斯·巴泽达乌（Mattias Basedau）和帕特里克·科尔纳（Patrick Köllner）就曾提到，区域学研究者需要以内部区域、区域间和跨区域比较为基础，制定出新的研究纲要^①。俄罗斯区域研究学派也在沿着同样的方向不断发展。尤其是在 A. Д. 沃斯克列先斯基的著作中，更广泛采用跨区域政治经济分析法的必要性问题屡次被提及（并得到解答）^②。

总体上可以说，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区域学模式取得了一定进展，其结果首先是苏联时期相当孤立的俄罗斯区域研究学派与世界学术重新联结，其次是创立了取代传统区域学的独特而完整的流派。在英语文献中，这个新的学派被称为“比较区域学”（Comparative Area Studies）、“国际区域学”（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全球区域学”（Global Area Studies）、“世界区域学”（World Regional/Area Studies）、“世界区域研究”（World Regional Studies），在俄语文献中则叫作“世界综合区域学”。

结 论

俄罗斯区域研究之所以迫切，是因为亟需区域学论域的概念化，而能够满足区域学及国际关系学研究者需求的理论工具也有待创建。此种情况在始建于2002年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外区域学”（2009年之前称为“区域学”）硕士培养基地得到了积极对待。苏联解体以来，随着俄罗斯学术的非意识形态化，与外国同行的经验交流越来越活跃，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由此形成了国内外区域学优秀成果紧密结合的独特学派。该学派最值得称道的奠基者是 И. Г. 丘林、A. Д. 波加图洛夫、A. Д. 沃斯克列先斯基、B. О. 别恰特诺夫、Л. С. 沃隆科夫、Д. В. 斯特列里佐夫，以及这所大学其他一些堪称表率教授。新的跨

^① Basedau M., Köllner P. Area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A Primer on Recent Debates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Japan Aktuell. 2007. № 2. p. 11.

^② 参见 например: Voskressenski A. D. Non – Wester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ceptualizing World Regional Studies. L.: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270 p.; 1. Voskressenski A. D. Regional Studies in Russia and Current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for Social/Historical/Ideological [R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gional Interaction in Eastern Eurasia//Reconstruction and Interaction of Slavic Eurasia and Its Neighboring Worlds/ed. Ieda O., Uyama T.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2006. pp. 3 – 41;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А. Д.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истемы и модели демократии на Востоке.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7. 190 с.; и другие работы.

学科流派被称作“世界综合区域学”。

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政治地理区域学）、莫尔多瓦国立奥加廖夫大学区域学研究所（社会经济区域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国外区域学）及众多设置该专业的俄罗斯高校，也各有其独立的流派。虽然对区域学研究对象与目标的理解迥然有别，但所有这些学派均遵循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参与制定的联邦高等教育国家教育标准（ФГОС ВО）。因而也可以说，形成了全俄罗斯统一的发展与探讨区域学问题的科学教育空间。

在概括俄罗斯区域学研究现状时，А. Д. 沃斯克列先斯基和他的同事特别指出，“在这个跨学科与整体化的方向上，空间的、时间的和结构的方法融为一体，旨在全方位地理解世界共同体综合性的、在地理上又相互区隔的区域特征，唯有把握这一特征，才能够在结合全球与区域规律及内部与外部规律基础上，找到一条最适宜的发展之路”^①。重要的一点是，区域层面在此不仅作为“超国家因素”（亦即由国家层面而衍生）或“次全球因素”（亦即由世界体系层面而衍生）而发挥作用，而且也作为某种超越国际关系研究自身范围的分析角度，将国际关系置于更宽广的区域语境下，纵览国际关系全球体系相对于区域的外部环境。

然而，新的跨学科流派的形成却超乎乐观主义者的期望，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区域学课程在俄罗斯大学里已开设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但其学术地位长期以来都不明确。起初，区域问题研究被视为地理学或经济学子学科，只能透过这两个领域的知识得以认知，直到 2014 年才被列入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ВАК）“政治学与区域学”专业目录，代码为 41.06.01^②。2015 年 9 月，根据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部部长 Д. В. 利万诺夫的命令^③，建立了联邦教学法联合会“政治学与区域学”（代码为 41.00.00）专业培养扩大班，“政治学”“国际关系”“东方学与非洲研究”“国外区域学”和“俄罗斯区域学”等科目均列入其中。这样一来，区域学便获得了教学科研的自主地位，其知识领域与政治学密切相关，但也有所区别。

由以上所述，必然出现一系列问题：区域学在何种意义上可被看作一项独立的学科？它是否具有作为独立学科所必需的特征（独有的主题、方法、学派等

① Мировое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Под ред.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 М. : Магистр; ИНФРА — М, 2014. С. 24.

② Приказ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РФ от 2 сентября 2014 г. № 1192.

③ Приказ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РФ от 8 сентября 2015 г. № 987.

等)? 政治学方法是否适用于区域、区域子系统及区域复合体分析, 如果适用, 那是在何等程度上? 单凭政治学方法是否就足以对区域问题展开充分研究, 或者说, 必须同历史学、地理学及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 如果需要方法的结合, 那又是按照怎样的比例, 而最关键的是, 此类方法的合成究竟应当如何实现? 本文涉及的所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答。

对区域学论域的再认识和区域学方法论的完善, 反映出国际关系体系及世界政治转型的自然演进, 一方面来说, 二者均处于全球化、“全球本土化”(глокализация)^① 和区域化作用之下, 另一方面则受到东方学讨论的解构之影响。民族的和非西方的区域研究学派(例如俄罗斯学派和中国学派)开始逐渐形成, 它们不仅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西方流行的理论和概念(通常由英美或欧洲材料而构建), 而且创造出各自的术语系统, 并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方法基础。由于世界区域文化历史特征各自有别, 面对全球化挑战, 各区域本土反应也不尽相同, 这便赋予跨区域比较研究以独特价值。令人欣喜的是, 俄罗斯学派在区域研究领域居于领先地位。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glocalisation, 又译作“全球在地化”), 由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提出, 意指全球因素与本土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 即全球现象交集在本土层面和本土现象进入全球层面。